

李寒梅 著

riben minzuzhuyi xingtai yanjiu

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商务印书馆

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李寒梅 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 李寒梅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8779-7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日本
IV. ①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081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

李寒梅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779-7

2012年4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2

定价: 33.00元

目录 Contents

绪论 001

第一章 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原生形态 051

第一节 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一般起源 052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变 062

第三节 民族主义原生形态与日本的民族主义 082

第二章 日本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096

第一节 日本前近代国家体制及其认同形态 097

第二节 日本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110

第三节 天皇制家族国家的形成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 128

第三章 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及其成因 157

第一节 战后日本国家的出发点与民族主义的退潮 158

第二节 社会结构的转型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战后形态 176

第三节 新保守主义政治与大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201

第四章 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特征 226

第一节 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表现 227

第二节 新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249

第三节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态与特征 263

第五章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形态及其成因 284

第一节 全球化的冲击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 285

第二节 日本国内社会转型与新民族主义 301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及民族国家成熟期的民族主义 320

结语 349

参考文献 365

后记 390

绪论

一、问题的缘起和研究对象

在进入新世纪的 2001 年初，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杂志《SAPIO》推出了所谓“新世纪特大号”的特刊，其主题为“日本·新民族主义宣言”。该特刊明确提出，“日本的再生”需要新的国家目标；为此，必须重新构筑“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气概以及价值观”。^[1]从而，该“宣言”就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出现的新民族主义潮流趋向高涨的一个标志。

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伴生物，曾在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人类自进入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个前进的脚步都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的每一次演变，都有民族主义伴随其中。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中，民族主义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族主义引导了日本的近现代历史。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曾经作为维新变革的重要内容，推动日本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得以迅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但它的极端膨胀，也将日本引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在给邻国和自

[1] Simulation Report「ニッポン・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宣言：21 世紀前半の日本にはコスモポリタンは必要ない」，（国際情報誌）『SAPIO』新世纪特集，小学館，2001 年 1 月 24 日/2 月 7 日合併号。

身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战前历史的反省，日本的民族主义曾经被作为战前极端国家主义而遭到否定，在战后社会思潮的洪流中一度消沉，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但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明治维新百年来梦想的实现，日本的现代化任务趋于完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现实，重新激发起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感情再度滋长，重新掀起波澜。它的代表性呼声，就是要求在国际上取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从而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大国主义思潮。完成现代化赶超任务的日本，开始进入重新设计和选择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的新的转型时期。

然而，就在这一转折关头，甫入90年代，日本即遭遇了冷战体制的瓦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随着战后现代化赶超时期的最后辉煌——“平成景气”的结束，“泡沫经济”^[1]瞬间破灭；随着与国际冷战体制相适应

[1] 1989年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明仁天皇继位，通算为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年号取自中国《尚书·大禹》中“地平天成，万世永顺”一语，定为“平成”，故而1989年为平成元年，乃平成时代的开端。所谓“平成景气”，概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这段时期的长短，根据不同的经济指标，认识有所不同，但一般指1986年12月至1991年2月之间的4年零3个月。这是日本战后仅次于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第二次经济强劲发展时期。因各项经济指标在1989年即“平成元年”均达到空前的最高水平，故被称为“平成景气”。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受到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尤以股票交易和土地交易等虚体经济对国内消费需求膨胀的刺激最为明显，因而也被称为“泡沫经济”。由于账面资产价格的迅猛上升，大大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规模，故日经平均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达到38957的最高点之后即开始迅速下挫；1991年2月开始，土地价格亦大幅下跌，“泡沫经济”宣告破灭。1992年8月，日经平均股价跌至14000点左右。仅仅一两年间，大量账面资产化为乌有，由此导致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的战后日本国内体制——“五五年体制”走向解体，日本人经历了国内政治的急剧动荡、经济状况的长期萧条、增长的长期低迷，加上“海湾战争”及中国的迅速崛起对国民心理造成的打击，80年代提升起来的民族自信心与90年代日本面对的现实之间形成反差。由此，日本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迷茫和混乱。进入重大转型期的日本，似乎迷失在了世纪转换的十字路口。

在这种对现实与前途的混沌和迷茫中，日本人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这股潮流正是迎接新千年之际《SAPIO》特刊的主题，即被称之为“新民族主义”的思潮。这股潮流试图从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的传统价值中重新找回自我和自信，呼唤“爱国心”，重新树立凝聚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价值观。它最典型的诉求就是重新认识和评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当然也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历史，反映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即在重新设计和选择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的转型进程中，国家主义的色彩趋于浓厚。在此过程中，新民族主义一度相当引人注目，似有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趋势。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曾经极端膨胀并给亚洲邻国带来巨大灾难，故20世纪90年代新民族主义的出现，自然地重新唤起了周边国家的人们对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惨痛记忆。因此，这一潮流的兴起，当然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勃兴，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为民族主义信念而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不同民族及种族社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随处可见。由民族主义引发的事态导致了前苏联、东欧地区、海湾、波黑、车臣等多次规模不

一的民族冲突与战争；在西欧，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排外主义的风潮；在东亚，不仅在日本，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这一时期同样也都进入了民族主义的高扬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族主义“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1]。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甚至说：过去十年，“种族民族主义取代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为全世界社会运动和政治理想的基础和语言”^[2]。

由于民族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展开的，因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热门领域。而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传统价值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国际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勃兴的现实，则自然地提升了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从而，冷战后的民族主义问题，也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焦点。

从上述对日本和对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再兴的两个关注出发，自9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也逐渐出现了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热潮。其中，对日本的社会思潮特别是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学界尤为瞩目。本书最初的选题背景，也正是缘起于对此问题的关注，即：如何认识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不过，就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来说，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一个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现象，如果只从其本身去寻找答案，显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全面、透彻地认识这

[1]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2]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正文第1页。

一思潮，需要对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的探究，特别是需要把它放在日本民族主义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去加以认识。

纵观日本历史，自近代以来，其民族国家的发展以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以及冷战终结三大转折点为标志，呈现出三个比较清晰的阶段。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三个阶段、三大转折，也是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的三次转型。如果将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兴起与沉浮（或者高潮与低潮）的演变曲线来显示的话，那么，伴随着每一个阶段的转折，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起伏波动规律，其表现形态显示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由此，日本民族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与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演变之间就显示了密切的联系。因而，如下问题就成为本书试图探讨的核心，即：在日本民族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又是什么因素或者什么原因在影响、推动或者刺激着日本民族主义的兴起或沉浮？本书力图借助民族主义的相关理论，从日本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创建、建设及发展的历程，对上述问题加以回答和阐释。

因而，本书设定的研究对象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态。所谓“形态”，简言之，即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形态，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其基本内容是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国家与国民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因而，本书的研究对象，即以民族主义这一基本内容为基础，从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出发，探讨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态及其演变，以及民族主义形态与日本民族国家发展转型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揭示推动和影响日本民族主义发展及起伏变化的主要因素。

从纵向上看，自近代以来，日本民族国家创建和发展的历程，以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以及冷战终结为三大界标，经历了近代、战后及当代（冷战后）三个时期。这种时期划分，是以日本近现代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为依据的。这三个时期同时也是日本从国家的近代化、现代化走向后现代社会的历程。在这三个时期中，日本的国家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或者称之为三次重大转型。而伴随着这三次转型，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先后呈现出了三种形态，笔者将其归纳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形态（天皇制民族主义）、战后形态（企业社会型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形态。在这三种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交织着日本民族主义低潮、高潮交替演进的发展态势。由此可以显示，在日本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以及民族主义形态演变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从横向上看，就世界范围而言，日本的文明发展和国家发展都呈现出相对的后进性或者“后发性”特征，这使日本的文明发展和国家发展，显示出一个突出特点，即这种发展经常处于对先进文明或先发国家的追赶之中。这一特点，在日本的文明发展和国家发展过程中，就形成对外来文明、外来发展模式的学习和模仿与自身文明、自身传统的保持和发扬之间，或融合或冲突的内在矛盾性。这种内在矛盾性，在近代以后的日本国家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此构成日本民族心理与国家现实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中，就体现为近代时期的“脱亚入欧”与“日本主义”、战后时期的“依附美国”与“日本人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大潮冲击下的民族心理焦虑与适应性变革，从而也显示出日本民族国家发展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而如果将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进行观察，则会发现，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是以大量引进、吸收外来文明成果为主，即以日本自身传统与外来文明融合的一面为主，民族主义趋向平缓或者沉寂；而当现代化发展进入较为成熟的时期后，民族

自信提升,则对自身价值及民族传统的推崇便会增长,即自身传统与外来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上升,就催动民族主义趋向高涨。由此可见,日本民族主义上述三种形态的演变,在纵向上伴随着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在横向上伴随着日本与外部关系的转变,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日本民族主义兴起与沉浮(高潮与低潮)的轨迹,而且显示了日本国家发展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相关性。

因此,本书试图以上述三个时期中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方式为基础线索,以日本民族主义三种形态的演变为基础,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纵向视角和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横向视角,建立起论述的基本框架;同时,本书主要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和归纳的方法^[1],借助民族主义相关理论,勾勒出一个日本民族主义形态演变的整体轮廓,并力图从日本民族主义各历史阶段形态演变的特点,归纳出推动或者影响日本民族主义兴起与沉浮的主要因素,从而从这种视角揭示日本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大多聚焦于新民族主义思潮,且较多集中于它在现实政治层面的表现或者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而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身发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还相当薄弱;从民族主义的相关理论出发,对日本民族主义进

[1] 所谓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与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辨析历史的真伪,对历史进行真实的描述。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法,则是根据已知的历史事实,总结和发现与现实国际关系现象有关的经验。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分析法,并不强调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对历史文献一般不采取怀疑态度,而是依据对历史文献或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归纳,总结国际关系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以及对现行国际关系的启示。参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44页。

行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因此，本书期待通过对上述问题的阐释，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规律的把握，也有助于对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形成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总体而言，本书的尝试，相信可以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对于通过日本的个案，进一步丰富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是有意义的。

二、本书涉及的核心概念

民族主义是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但是，迄今为止，民族主义的研究并未形成一个已得到清晰严谨阐释的理论体系，学术界对民族主义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解释也五花八门。为民族主义下定义，让所有研究者都感到困惑却又无法回避。由于本书并非以民族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而是期待借用民族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便规范对日本的研究并界定研究的范围，因此，本书并不试图为民族主义及其相关概念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只是借鉴学术名家业已作出的分析，从世界范围内各种民族主义的共性出发，归纳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在最基本、最普遍的涵义上把握其概念。

本书涉及的基本概念是“民族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形态与新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对于日本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及用语问题，也将在本节进行说明。而关于在日本语境下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将在第一章进行解释；一些派生的概念，则以注释方式或在文中随时加以阐释。

（一）关于“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基本释义

本书所说的“民族”，是指现代民族（即 nation）；“民族国家”，是指现代国家（即 nation-state，一般也称 nation）。

就抽象的理论意义而言，对“民族”的准确解释与定义众说纷纭。从“民族”一词的起源来说，在欧洲，构成相关概念基础的词汇古已有之，如 tribe, ethnic group, race, people 等，直到 nation。英文 nation 一词是由拉丁文的 natio 演化而来，natio 原指一类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也就是说，从“民族”概念的来源而言，它本来是一个与自然的乡土、地域以及血缘有关的词汇。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基于自然的地域、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生活、文化、习俗、语言、宗教及心理特征的“民族”，几千年来也一直存在。这种民族被称之为“历史民族”，它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概念。

但是，natio 一词从 15 世纪到 18 世纪，不断演化，政治含义越来越多，逐渐超越了自然乡土的概念。随着欧洲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出现了相同或相近语言、地域的种族逐渐聚合的趋势；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世俗化的王权开始增强，从而逐渐打破了封建割据的状态和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经过法国大革命以后，natio 的含义就完成了从自然意义上的乡土（land），到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构成的共同体（country），再到将建筑在其上的政治组织与权力机构（state）也包含在内的演变过程，从而成为 nation。也就是说，nation 不再是一个局限于自然的乡土、血缘及文化的概念，它同时包含了政治性的地域范围及其政治组织以及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民的涵义。而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民，可能是一个历史上既有的种族（即历史民族），也可能是由多个

种族聚集而成的人民共同体。可见，nation 既是一个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包含了生活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人民的共同体。相对于中世纪欧洲宗教的普世价值观以及教会的统治权而言，这个 nation 的突出特征是：明确的领土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的人民和拥有这些人民的政治机构，特别是它要求拥有（独立于教会之外的）自己的主权。

由此，nation 一词，就不仅与“种族”一词有了严格的区别，也与基于乡土、血缘概念自然形成的古代国家有了严格的区别。相对于“种族”而言，它就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即“现代民族”；相对于“古代国家”而言，它就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即“现代国家”^[1]。当然，“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的形成都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原本那种强调自然的乡土、血缘关系以及共同文化特征的“历史民族”，是基于“种族”（ethnicity）概念的民族，它是古已有之的；而作为 nation 的“民族”则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它的形成过程与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一致，或者说它是应现代国家建立的需要而产生的。美国著名学者卡尔·多伊奇指出：“一个民族（nation）就是一个拥有国家的人民（people）”。^[2] 换言之，即“民族”（nation）

[1] 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最早出现于近代的欧洲，而亚非拉地区近现代国家及民族的形成则主要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其中相当一部分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而便有了“近代国家”、“近代民族”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不同提法。但严格来说，“近代国家”、“近代民族”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应为同义语。本书从叙述清楚、前后一致起见，在一般意义上一律使用“现代国家”或“现代民族”的提法，但考虑到在某些历史阶段上日本的特殊性，本书在有关日本近代时期（明治维新至二次大战结束前）民族与民族国家的论述中，也根据具体情况，使用“近代民族”或“近代国家”的提法。

[2] Peter Alter, *Nation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p.6. 原文为：“A nation is a people in possession of a state.”

是只对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才适用的指称，^[1]即“国家民族”(state-nation)。可见，把“民族”概念化的需要，就在于历史上现代国家的产生，即国家需要“民族”这样的概念用以确定疆土、人民和主权。“脱离了关于‘国家’的概念，民族这一概念就丧失了历史的起源而无法定义”。^[2]也就是说，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才将包含在它政治主权范围内的种族与民众聚合成为一个“民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是“国家创造了民族”。^[3]这一过程，既可以体现为首先取得了政治统一的国家，其精英人物以共有的政治理念作为核心凝聚民众而形成成为一个民族；也可以体现为尚未取得政治统一的国家，其精英人物以共有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遗产作为核心凝聚民众而形成民族，而后建立起政治统一的国家。无论何种方式，作为 nation 的“民族”，都是由于创建国家的需要才得以形成，或者说，“民族”是为了让国家获得合法性才聚合而成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将“民族”的概念进一步区分为“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以层次区分，所谓“政治民族”就是作为 nation 的民族，或者叫“国家民族”(“国族”)^[4]；而“文化民族”则是作为政治民族下位概念的 ethnic group，即国内民族（也

[1]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2]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 页。

[3] 参见〔英〕埃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4—187 页。

[4] 就中国而言，“民族”(nation)一词是一个外来的译语。20 世纪初，nation 曾被翻译为“国族”。迄今为止，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在多数情况下依然习惯使用“国族”的译法；而内地学者则更习惯使用“民族”一词。不过，在对“民族”的概念进行解释时，内地学者有时也会使用“国族”一词。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第 13—14 页。

译为“族体”或“种族”)，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历史民族”。^[1]以形态区分，“政治民族”强调的是其构成成员的法律身份，因为公民政治地位是民族归属的标志，“文化民族”则强调的是共同历史文化塑造的共同心理特征以及文化的独特性。^[2]而当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融为一体，文化民族（历史民族）聚合成为一个“政治民族”，且其居住范围与国家的领土界限相一致，并且对外自主行使主权时，这样的国家就称之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可见，与古代国家突出自然地域和血缘关系相比，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性的组织，它强调的是主权概念。这样的国家是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开始形成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也被称之为“主权国家”。因而，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与现代主权国家不可分割的概念。在此意义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它认为国家即等同于民族，国家和

[1] 王缉思：《民族和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另参见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2] 参见韦民：《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 即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于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和约。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是欧洲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时期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悉数卷入。这场战争起于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但在战争进程中，宗教外衣被抛弃，各国均开始赤裸裸地为国家利益或准国家利益而战。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在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四分五裂的欧洲以国际会议和签订和约的方式，肯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以国家主权学说推翻了天主教神权统治的最高权威，从而在欧洲形成了一个由主权平等的独立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和约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